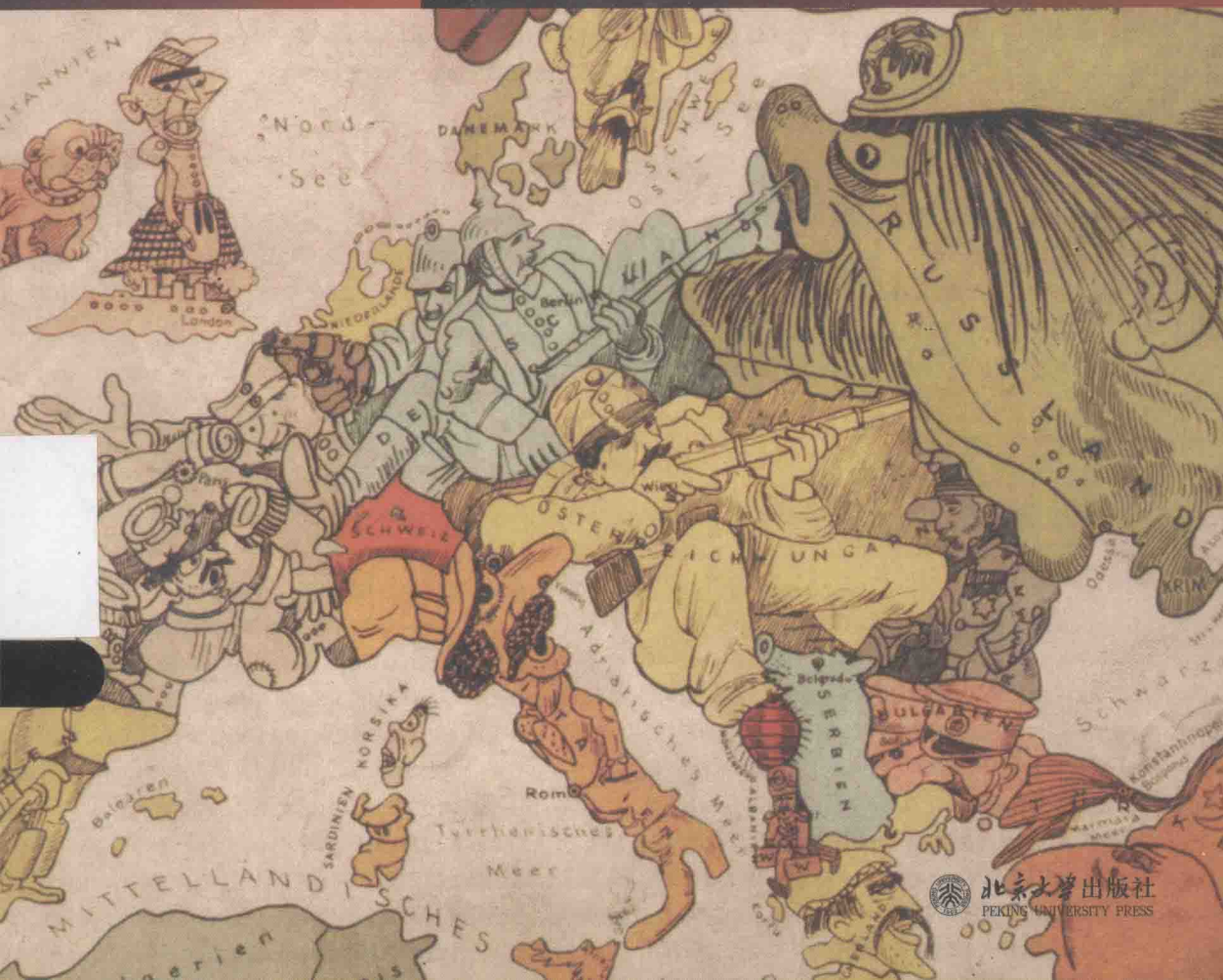


一战史

THE FIRST WORLD WAR

[英] 约翰·基根 著
张质文 译

世界史图书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史图书馆

一战史

THE FIRST WORLD WAR

[英] 约翰·基根 著
张质文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52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战史 / (英)基根(Keegan, J.)著; 张质文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8

(世界史图书馆)

ISBN 978-7-301-24567-5

I. ①一… II. ①基… ②张…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
战-史料 IV. ①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0442号

Copyright: ©1998 BY JOHN KEE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一战史

著作责任者：〔英〕约翰·基根(John Keegan)著 张质文译

责任编辑：张晗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567-5/K·105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0577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7.25印张 450千字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献给基尔明顿 (Kilmington)
于 1914—1918 年的大战中逝去的人们

致 谢



我在成长过程中与那些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男人和在家中等待他们消息的女人们为伴。我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以及我的岳父，都参战并且得以幸存。父亲和岳父深藏心底的战争经历第一次让我领略了战争的本质。我的姑姑是第一次大战所造成的大量“老姑娘”中的一员，她对我说，关于那些东西的某种焦虑一直会持续到她生命的尽头。我从他们，以及这些年中曾与我交谈过的、直接或间接卷入这场战争悲剧的老兵身上获取了撰写本书的灵感。 xi

我写下的文句中弥漫着个人的回忆。它的基本内容则来自多年的阅读。我要感谢桑霍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 的图书馆管理员和工作人员、参谋学院 (Staff College)、美国军事学院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瓦萨尔学院 (Vassar College) 和《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从它们那里，我获得了最有价值的书籍。我尤其感谢西点军校历史系的主任罗伯特·道蒂 (Robert Doughty) 上校，以及他的副官理查德·福克纳 (Richard Faulkner) 少校。在我 1997 担任在瓦萨尔学院戴尔玛斯客座教授 (Delmas Visiting Professor) 时，福克纳少校允许我使用宏伟的西点军校图书馆。我还要对伦敦图书馆的管理员和员工，以及“西线协会” (Western Front Association) 的主席托尼·诺耶斯 (Tony Noyes) 表示谢意。

在这本书诞生的过程中，我从哈钦森出版公司的编辑安东尼·惠托姆 (Anthony Whittome)、克诺夫出版公司的编辑阿什贝尔·格瑞姆 (Ashbel Greem)、图片编辑安妮—玛利亚·埃利希 (Anne-Marie Ehrlich)、地图绘制员艾伦·吉利兰 (Alan Gilliland)、《每日电讯报》的图片编辑，以及一如既往地，我的代理人安东尼·希尔 (Anthony Sheil) 处受惠良多。林赛·伍德 (Lindsey Wood) 录入文稿、核对参考文献、修正文中前后不一的错误，并处理了所有与出版相关的难题。与从前一样，她证明自己是一位无可匹敌的秘书。

在其他提供了各种各样帮助的人中，我要感谢《每日电讯报》的编辑查尔 xii

斯·穆尔 (Charles Moore) 的宽容, 感谢我的同事罗伯特·福克斯 (Robert Fox)、蒂姆·布彻 (Tim Butcher)、特雷西·詹宁斯 (Tracy Jennings)、露西·戈登—克拉克 (Lucy Gordon—Clarke) 和沙伦·马丁 (Sharon Martin) 的协助。我尤其亏欠《每日电讯报》的所有者康拉德·布莱克 (Conrad Black) 一份特殊的人情。

基尔明顿的朋友霍诺尔·梅德拉姆 (Honor Medlam)、迈克尔和内丝塔·格雷 (Michael and Nesta Grey)、米克·劳埃德 (Mick Lloyd) 和埃里克·库姆斯 (Eric Coombs) 使我有机会写作这本书。与从前一样, 我要把爱和感激献给我的孩子和女婿, 露西和布鲁克斯·纽马克 (Lucy and Brooks Newmark)、托马斯 (Thomas)、马修 (Matthew) 和罗斯 (Rose), 以及我亲爱的妻子苏姗妮 (Susanne)。

基尔明顿庄园

1998年7月23日

插图来源缩写：

AKG—AKG, London

ETA—E. Archive, London.

Novosti—Novosti Press Agency, London

RHPL—Robert Hunt Picture Library, London

TRH—TRH Pictures, London

目录

致 谢 /1

第一章 欧洲的一场悲剧 /1

和睦的欧洲 /7

士兵的欧洲 /13

第二章 战争计划 /19

第三章 1914 年的危机 /39

第四章 边境线和马恩河上的战役 /59

边境之战 /77

桑布尔河战役 /81

蒙斯战役 /84

大撤退 /86

马恩河战役 /96

亨奇中校的使命 /102

第一次伊普尔战役 /109

第五章 东线的胜利与失败 /119

加利西亚和塞尔维亚 /131

伦贝格战役 /134

东线的战争 /139

华沙战役 /141

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山的冬季战役 /144

第六章 僵持 /151

西线的战争策略 /161

1915 年的西线战役 /165

第七章 西线以外的战争 /175

- 德属殖民地的战争 /176
- 巡洋舰之战 /182
- 南部和东部的战争 /188
- 加利波利 /201
- 塞尔维亚和萨洛尼卡 /216

第八章 大战之年 /223

- 海上的战争 /224
- 三条前沿上的进攻 /239
 1. 凡尔登攻势 /242
 2. 索姆攻势 /248
 3. 更大范围内的战争和布鲁西洛夫攻势 /260

第九章 军队的动摇 /269

- 参战方的情绪 /276
- 法国的兵变 /280
- 俄国的叛乱 /289
- 意大利前线的骚动 /297
- 美国、潜艇和帕斯尚尔战役 /303
- 康布雷战役 /320

第十章 美国与大决战 /323

- 战争在东线的继续 /328
- 西线的战争危机 /339
- 帝国的崩塌 /359

注释 /371

参考书目 /393

索引 /401

第一章

欧洲的一场悲剧



3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令人悲伤而又并非必然的冲突。它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军事冲突发生之前充满危机的五个星期里，如果谨慎小心，并且人们心中共有的善意能够发出声音，导致战争爆发的一连串事件可以在任何一刻终止；它令人悲伤，因为第一次冲突的最终后果带走了1000万人的生命，使更多人的情感备受折磨，摧毁了欧洲大陆仁慈而乐观的文化，而且在四年之后枪炮声终于沉默的时候，留下一份政治敌意与种族仇恨的遗产——如此剧烈，以致不提及它们，就无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二战是一战的直接产物，造成了五倍于一战的人员伤亡，以及无法衡量的、更加巨大的物质损失。1922年9月18日，阿道夫·希特勒向战败的德国政府提出挑战，而17年以后，他将把这变成现实：“两百万德国人不能白白牺牲……不，我们绝不原谅，我们需要——复仇！”^[1]

他所宣扬的“复仇”的遗迹遍布被他蹂躏的欧洲大陆——见于曾被他自己挑起的战略轰炸夷为平地的德国城市中心，这些城市如今已经得到重建；同样也见于曾被他摧毁的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华沙、鹿特丹、伦敦的城市中心。如今已被遗弃的大西洋壁垒是他“复仇”欲望的遗迹，它们是为了在海湾阻挡敌人而建造，但却终归徒劳无功。这样的遗迹还有奥斯维辛日渐腐朽的临时营房，以及被遗忘在索比堡（Sobibor）、贝尔塞克（Belzec）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灭绝集中营。波兰灰烬中的一只童鞋，一段锈迹斑驳的铁丝网，毒气室遗址附近残存的骨灰，这些是二战的遗迹，同样也是一战的。^[2]它们的先辈是那些把战壕纵横的田野弄得七零八落、在潮湿的早晨使法国的空气中充满锈蚀味道的铁丝网，

4 是游客在篱笆下发现的发霉的皮绑腿，是生锈的铜徽章或纽扣、已经腐蚀的弹夹或带着凹痕的弹片，也是索姆浸透鲜血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今日仍能发现的无名尸体。“我立刻停下工作。我非常尊重你们牺牲的英国人。”——正如令人不忍寓目、描绘1945年在贝尔森（Belsen）被埋入万人坑的尸体的影像，可以在1915年第二次香槟战役后法国士兵堆积同袍尸体的模糊的镜头中追根溯源一样。一战宣告了大规模杀伤的到来，而二战则把它带到冷酷的顶峰。

还有更加正式的纪念物。很少有法国或英国的社区没有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

死者的东西。在英格兰西部的一个村庄里，岔路口的葬礼十字架底部刻着一串死者的名单。然而，这是后来才刻上去的。十字架本身却是用于纪念那些没能从一战战场上返回的年轻人，而他们的人数是二战中死亡人数的两倍。1914年的两百人口中，W. 格雷 (W. Gray)、A. 拉帕姆 (A. Lapham)、W. 牛顿 (W. Newton)、A. 诺里斯 (A. Norris)、C. 佩恩 (C. Penn)、L. 佩恩 (L. Penn) 和 W. J. 怀特 (W. J. White)，或许这个村庄每四个军役年龄的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没能从前线返回。他们的姓氏早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在教堂的登记簿中，今日仍存在于村庄里。从这不难看出，大战带来了自诺曼征服前盎格鲁—萨克森时代人们定居于此以来空前的伤心之事。令人欣慰的是，从那以后再未曾有过。纪念十字架是教堂以外村庄唯一拥有的公共纪念物。在每个村庄，在每个郡的市镇，以及在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的教区大教堂里都有类似的东西，而刻上的名字以倍数增加。在法国的每一所大教堂里也都可以看到同类的纪念物，在这些教堂里会看到碑上铭刻着如下字句：“献给神的荣耀，并纪念大英帝国死于大战中的一百万人，他们中的多数长眠于法国。”

毫无疑问，在村镇附近会有为了本地的死者而树立的纪念物，同样的东西也会见于周围的每个城镇和村庄。法国在大战中损失了将近两百万人，每九个开赴战场的人中就有两个死去。蔚蓝的地平线上，向着东方的德国前线端起刺刀的勇敢的法国战士雕像是他们的象征。刻写在底座上的名单之长令人心碎，更令人心碎的是同样的姓氏多次出现，表明一个家庭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成员丧生。大多数大战参战国的市镇和城市中都刻着类似名单的石碑。我发觉，最令人黯然神伤的是矗立在威尼斯泻湖湖畔穆拉诺 (Murano) 大教堂旁边、内敛的古典风格纪念碑，碑上刻着一排又一排第1骑兵师小伙子们的名字。他们来自波河谷地，死于严酷的尤利安阿尔卑斯山 (Julian Alps) 高地。在维也纳的教堂，我曾被同样的感情所触动。在那里，冷酷的石碑令人回想起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所经历的牺牲。而今，这一切却几乎已被历史遗忘。^[3]

德国人因为德国军队的声名受累于纳粹政权的暴行，没有办法合宜地哀悼他们死于二战的400万生灵；因为很多人死在他国的土地上，他们发现为因为一战的死者而感到的痛苦安排一种合适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同样困难。如果这种困难不是感情上的，也受限于物质条件。布尔什维克革命使他们无法接近东方战场，而西方战场的主人最多也不过是勉强允许他们取回并掩埋尸体。无论在心理还是土地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没有什么地方容得下为德国人建立战争公墓。

当英法就士兵的永久安葬达成谅解——这些花园般的墓地在1920年代沿大战的西线星罗棋布，惊人地美丽——德国人却不得不在晦暗的角落挖掘万人坑以埋葬他们的死者。只有在东普鲁士，史诗般的坦能堡（Tannenberg）战役发生的地方，他们得以为战死的士兵建立一座胜利者的陵墓。在本土，远离德国的年轻人战死的前线，他们以大大小小教堂中纪念碑的形式寄托哀思。它们主要从朴素的鼎盛时期哥特建筑艺术中汲取灵感，常用的主题是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的“基督受难图”（Crucifixion）或是霍尔拜因（Holbein）的“坟墓中的基督”（Christ in the Tomb）。〔4〕

6 格鲁内瓦尔德和霍尔拜因笔下的基督形象是孤零零地在最后的挣扎中流血、受难与死亡的躯体。这个形象恰好是大战中普通士兵的象征，超过一半在西线阵亡的士兵被丢弃在战场的荒野中，在东线可能更多。无名尸体的数量如此巨大，以致刚一停战，一位曾担任随军牧师的英国国教牧师便首先提出，最恰当地纪念所有这些无法辨认的战死者的方式是掘出其中的一位，并把他重新安葬在荣耀之地。选定的死者被带到西敏寺，并安置在入口处，上方铭刻着：“他们把他安葬于诸王之中，因为他尽善于神与家园。”同一天，也就是1918年11月11日停火两周年的日子里，一个法国的无名士兵被安葬在巴黎凯旋门下。后来其他许多战胜国也在首都重新安葬了无名的士兵。〔5〕然而，当1924年战败的德国尝试为战死者建立国家纪念碑时，揭幕式却在政治抗议中陷入混乱。艾伯特（Ebert）总统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他的演讲之后，本该是两分钟默哀，但却被支持或反对战争的喊声打断。其后，揭幕式演变为一场持续整天的暴乱。〔6〕战败的痛苦持续分裂着德国，直到九年后希特勒的到来。就任总理不久，纳粹文人就把希特勒——“无名下士”——描绘为“无名士兵”的代表，而魏玛共和国无法给他们应有的荣誉。不久，作为德国元首的希特勒就在演说中称自己为“大战中的无名士兵”。他种下了将会带走其他四百万德国人生命的战争种子。〔7〕

战争的仇恨易结难解。到1914年年底，也就是大战爆发4个月后，2000万法国男性——其中1000万处于军役年龄——中有30万人战死，60万负伤。到战争结束时，将近2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步兵，它是法国军队的主力，减员率是征兵数的22%。伤亡最惨重的是最年轻的年龄组：1912—1915年入伍士兵的伤亡达到27%—30%。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还没有结婚。不管怎样，到1918年，在法国有63万名战争寡妇，以及大量被剥夺了婚姻机会的更年轻的女性。1921年，20到39岁之间人群的性别比例为男子占45%，女子占55%。而且，在

战争中伤残的 500 万人中，数以十万计被列为“重度伤残”（grands mutilés），7意指那些失去四肢或是眼睛的士兵。或许最深重的痛苦由那些脸部受伤而致毁容的受害者承担，他们中的一些变得如此骇人，只得在农村建立隔离居住区，供他们一起在此休养。^{〔8〕}

德国战争一代经历的苦难与此不相上下。“1892—1895 年龄组在战争爆发时正值 19—22 岁之间，人口数量减少了 35%—37%。”总的来说，1870—1899 年间出生的 1600 万人在战争期间有 13% 以每年 465600 人的速度丧生。同大多数军队一样，军官队伍遭受了最惨重的伤亡，阵亡人数为 23%——常备军中为 25%——而士兵阵亡率为 14%。幸存的德国“重度伤残”者中，44657 人失去一条腿，20877 人失去一只手臂，136 人失去双臂，1264 人失去双腿。另外还有 2547 人因战争致盲，一小部分人头部受重伤，其中大部分后来死去。总计有 205.7 万名德国人死于战争或在战后因伤致死。^{〔9〕}

尽管德国是有统计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俄国和土耳其的死亡人数仍未精确统计过——但从比例上来看却并非情况最严重的。情况最严重的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战前人口为 500 万，其中 12.5 万士兵战死或死亡，其他 65 万名平民死于贫病交加。这造成了高达 15% 的人口损失。与之相比，英国、法国、德国约为 2%—3%。^{〔10〕}

即使这些相对较低的死亡率也留下了可怕的心灵创伤，因为它降临在社会男性中最年轻、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人身上。当战争逐渐隐退到历史深处，人们逐渐习于谴责对“失去的一代”的哀悼，视之为创造出来的神话。人口学家证明，人口的自然增长很快就可以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而一些铁石心肠的历史学家则坚持说，这些损失只有一部分家庭感觉得到。他们论辩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有 20% 参战的士兵死亡；而占人口总数比例更低些，为 10% 或者更少。对大多数人而言，战争不过是生活的一个片段，对常态的一次偏离，一旦枪声停止，社会很快就会恢复如初。

这是一种自大自满的判断。与 1939—1945 的大战相比，一战的物质损失确实更小。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欧洲的大城市像二战中德国所有的大城市那样遭到空8中轰炸，被严重破坏甚至摧毁。一战是一场发生在乡下的战争，无论在东线还是西线都是如此。战场很快便成为农田或草场，而且除了凡尔登（Verdun）附近，毁于炮击的村庄很快得以重建。战争对于欧洲的文化遗产也没有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伊普尔（Ypres）的中世纪纺织品市场（Cloth Hall）今日依然矗立，一如

1914—1918年的战火以前；阿拉斯（Arras）的市镇广场、鲁昂（Rouen）的大教堂也是这样。而在1914年一次非典型的汪达尔行为中被烧毁的鲁汶（Louvain）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也在战后一点一点地恢复。

尤其重要的是，交战者并未对卷入其中的平民施以蓄意的伤害和暴行，而这是二战的典型特征。除了在塞尔维亚以及开始阶段的比利时，人们并未被强迫放弃自己的家园、土地和非军事性的职业；除了在土耳其亚美尼亚，也没有人遭到种族灭绝；而且，尽管奥斯曼政府对其亚美尼亚属民的政策如此骇人，但有组织的、致其死亡的强迫迁徙更适合归因于奥斯曼帝国政策的历史，而非大战本身。不像二战那样，一战中没有系统的种族取代，没有蓄意的饥饿，没有对财产的剥夺，也几乎没有屠杀和暴行。与国家宣传机器极力证明的相反，除了战场上的残酷，它是一场很奇怪的文明战争。

然而它确实对文明造成了伤害，对欧洲启蒙运动理性而自由的文明造成了伤害。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而且，全世界的文明都因此遭到了损失。尽管战前欧洲各国对于大陆之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行为都是帝国主义的，但却都对宪政、法治以及代议政府等原则抱有敬意。战后的欧洲很快放弃了对这些原则的信心。它们在1917年以后的俄国、1922年以后的意大利、1933年以后的德国丧失殆尽，而在由战后的移民创建或扩大的中南欧政权中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不合时宜的存在。战后的十五年里，极权主义——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抗拒自1789年君主政体衰退以来便激发着欧洲政治的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的体系——几乎在所有地方发展起来。极权主义是战争以其他方式所作的政治延续。它使追随它的选民大众一致化、军事化，普遍地剥夺选民的选举权，激发他们最低层次的政治本能，并边缘化和恐吓一切内部反对者。大战结束不到二十年，欧洲又一次被一场新战争的恐惧所包围，这起因于旧世界漫长的19世纪和平中闻所未闻的军阀们更加咄咄逼人的行动和野心，而在对于结局的希望处于最低点时，一战曾被称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伤害也在于重整军备的洪流中那些一战中仅曾作为雏形而为人所知，但却威胁使二战成为一场更大灾难的武器：坦克、轰炸机、潜艇。

1939年到来的二战毫无疑问是一战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延续。它的环境，德语民族对于自身在其他民族中地位的不满，是与一战相同的；它的直接原因，一个德语统治者与斯拉夫邻居的争吵，也是与一战相同的。相关人物尽管担任不同的职位，也与一战相同：1939年的法军总司令甘末林（Gamelin）曾是1918年协约国最高司令官福煦（Foch）的重要参谋；1939年的海军大臣

丘吉尔 (Churchill) 在 1914 年已曾担任该职；“第三帝国的第一士兵”希特勒，在 1914 年 8 月曾是德皇威廉第一批志愿兵中的一员。战场也将是相同的：1940 年 5 月德国豹式坦克轻而易举地跨过 1914—1918 年间凡尔登不可逾越的默兹河 (Meuse)；阿拉斯曾是部分英国远征军在西线经历的最糟糕战壕战的焦点，在 1940 年则上演了英国军队仅有的一次成功反击；华沙 (Warsaw) 以西一条狭窄的水道布楚拉河 (Bzura) 对于 1939 年和 1915 年的东线行动同样至关重要。1939 年出征的军人中很多与 1914 年是同一批人，那时他们更年轻、级别更低，相信“在树叶落下以前”就能胜利返回家乡。然而，这些幸存者或许承认，这次是不同的。在 1939 年，对战争及其威胁的恐惧更深，对它的真相也知道得更加清楚。与之相比，1914 年的战争犹如晴天霹雳降临到对它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们头上，他们甚至曾怀疑战争是否会再次困扰他们的大陆。

和睦的欧洲

1914 年夏天的欧洲享有一种和平的丰饶，它深深地依赖于国际汇兑和合作，以致相信不可能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观点成为共识。1910 年，一本分析普遍的国际经济依赖的著作《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 畅销各地。作者诺曼·安吉尔 (Norman Angell) 论证：所有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战争将导致国际信贷的中断，这要么会阻止战争的爆发，要么会使它提前结束。这引起了那个年代工商业社会的热烈共鸣。1873 年奥地利银行业的一次失败引发了 20 年的萧条，但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因为原材料以及工业产品价格的下降，这一萧条已经结束，工业生产再次开始扩张。新种类的产品——电器、化工染料、内燃机交通工具——诱惑着消费者；新的廉价原材料来源被发现；首先是在南非发现了新的贵金属矿藏，这滋养了信贷的发展。人口出现增长，1880—1910 年间奥匈帝国的人口增长了 35%，德国是 43%，英国是 26%，俄国则超过 50%，这极大地扩展了国内市场。1880—1910 年间有 2600 万人离开欧洲前往美洲和澳大利亚，移民增加了那里的产品需求；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帝国的巨大扩张，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把数以百万计的居民作为原材料的供应者和制成品的消费者卷入国际市场。交通业出现二次革命，1893 年蒸汽船的载重量首次超过帆船，极大地加速和扩大了越洋贸易的运转；而东欧和俄国铁路网的扩展（西欧和美国差不多完成于 1870 年）——在 1890 年到 1913 年从 3.1 万公里增长到 7.1 万公里——使这片盛产谷

11 物、矿产、石油和木材的地区加入国际经济的整体中。毫不令人惊讶，到世纪之初，银行业者的信心恢复，以黄金为基础的资本自由流动，大部分在 20 世纪前十年中以每年 350 万英镑的速度从欧洲流向美洲和亚洲，而且海外投资的收益成为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的个人和法人收入的重要元素；欧洲最小国家之一的比利时在 1914 年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这要归因于它很早就经历了工业革命，但也是因为银行、贸易商行和工业企业的活跃。

俄国的铁路、南非的黄金和钻石矿藏、印度的纺织工厂、非洲和马来的橡胶种植园、南美的牧场、澳大利亚的绵羊养殖、加拿大的麦田和庞大的美国经济——它到 1913 年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 1/3 的工业产出——的几乎每一个部门，都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吞噬欧洲资本。欧洲资本大部分通过伦敦流出。在 1890 年，英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为 2400 万英镑，法兰西银行为 9500 万英镑，德国国家银行为 4000 万英镑，而美国联邦储备则为 1.42 亿英镑。尽管英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规模相对较小，然而它与英国遍及世界的私人银行、贴现行、保险和贸易公司、产权和物产交易所的联系使它成为所有发达国家买、卖、借贷的主要中介。它的优势地位使诺曼·安吉尔提出的信条变得如此具有说服力。这种信条认为，对于顺畅的日常借贷平衡的任何干扰必然不仅会摧毁对于货币机制的信心——世界依赖这种货币机制生存——而且会摧毁系统本身。而平衡则由这种联系所掌控。

1912 年 1 月，就“银行业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一题目，安吉尔对伦敦银行业者协会论证道：

12 商业上的相互依赖，是银行业特有的标志，没有其他任何行业，即使贸易，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一方的利息和偿付能力与多方的利息和偿付能力相关联；必须对相互义务的适当履行充满信心，否则整个系统都将崩溃。这样的事实对证明美德终究不是建基于自我牺牲，而是文明的利己主义，以及更清楚、更全面地理解把我们彼此联系的纽带确实贡献良多。而这种更加清楚的理解与不断进步以创建一种必须建立更有效率的人类合作、一个更好社会的意识相关——不仅仅是群体之间的联系，而是所有人之间的联系。

曾任《金融时报》编辑的 W. R. 劳森 (W.R.Lawson) 在这次演说结尾观察到：“很明显，诺曼·安吉尔先生几乎完全掌控了这次会议。”^[11]